

武术鼓舞文化失忆的风险表征、机理归因与防御路径

夏晨晨

(吉首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 运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调研法和深度访谈法,以葫芦镇武术鼓舞为个案,以文化记忆理论为基础,构建“个体记忆—社会记忆—文化记忆”的分析框架,对现代化进程中武术鼓舞文化失忆风险及防御路径进行系统探究。研究认为,武术鼓舞文化失忆风险体现在3个方面:个体记忆存在传承主体老龄化与代际断层、记忆载体脆弱与记录缺失的风险;社会记忆存在传承模式单一与精英主导、记忆空间乡村式微与城镇失位、传播碎片化与商业异化的风险;文化记忆存在符号系统共识性编码缺失、内涵浅表化与基因失活的风险。其深层机理可归结为记忆主体的行为消解、记忆载体的符号消弭、记忆空间的文化压缩。为应对以上风险,提出了督促个体记忆的重复,夯实传承基石;重构社会记忆的符号,修复传承网络;锻造文化记忆的韧性,提升系统生命力的防御路径。

关 键 词: 民族传统体育; 武术鼓舞; 文化记忆; 记忆韧性

中图分类号: G8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26)04-0057-10

Risky manifestation, mechanism attribution and defensive pathway of cultural amnesia in martial arts drum dance

XIA Chenchen

(School of Sports Science,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416000,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field survey and in-depth interview, taking the martial arts drum dance of Hulu town as a case study and the theory of cultural memory as the basis,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individual memory-social memory-cultural memory" to systematically explore the risks of cultural amnesia in martial arts drum dance during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 risk of cultural amnesia in martial arts drum dance manifests in three aspects: individual memory faces risks such as the aging of transmission agents and generational gaps, as well as the fragility of memory carriers and the absence of documentation; social memory faces risks such as a monolithic transmission model dominated by elites, the decline of rural memory spaces and the loss of urban presence, as well as fragmented dissemination and commercial alienation; cultural memory faces risks such as the absence of consensus-based coding in symbolic systems, the superficialization of connotations and the inactivation of cultural genes. Given that,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behavioral dissolution of memory agents, the symbolic erosion of memory carriers, and the cultural compression of memory spaces. To address these risks mentioned above, this study proposes the following defensive pathways including urging the repetition of individual memory to solidify the inheritance foundation; reconstructing the symbols of social memory to repair inheritance networks; and forging the resilience of cultural memory to enhance the vitality of the system.

Keywords: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martial arts drum dance; cultural memory; memorial resilience

收稿日期: 2026-01-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3CTY010)。

作者简介: 夏晨晨(1991-), 女, 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 民族传统体育。E-mail: 137124563@qq.com

文化记忆是历经长期洗礼而传承的文化内容,能够为文化自信提供优质的文化基因和滋养^[1]。也就是说,博大深厚的文化记忆,正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其奠定了民族立得住、站得稳的根基,也积蓄了民族行得远的磅礴力量。作为我国优秀的传统体育文化,武术鼓舞是在湘西苗族鼓舞基础上,有机融合了武术的技击质感与舞蹈的韵律美感,从而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运动表现形式,其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生动范例,更以独特的身体符号和丰富的仪式展演,成为中华民族积淀文化记忆、增强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剧与文化多元交融的冲击,武术鼓舞面临文化失忆风险,已经严重影响到武术鼓舞文化基因延续与共同体认同建构。因此,如何有效锻造记忆韧性,系统防御武术鼓舞的文化失忆风险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本研究以葫芦镇武术鼓舞为个案,以文化记忆理论为基础,构建“个体记忆—社会记忆—文化记忆”分析框架,深入探究武术鼓舞文化失忆风险表征及其深层机理,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韧性防御路径。这不仅对武术鼓舞的活态传承与发展具有促进意义,也能够为其他遭遇相似窘境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从而有效提升民族传统体育应对现代性冲击的适应能力与文化延续力,为增强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全新动能。

1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文化记忆理论由德国学者阿斯曼夫妇于 20 世纪 90 年代在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基础上提出。哈布瓦赫将记忆划分为“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阿斯曼夫妇则认为“集体记忆”只涉及了个体当代记忆,未对人类长久以来的文化传承与记忆问题作深入研究。因此,文化记忆理论将记忆划分为 3 个层次,即个体记忆、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其中,“交往记忆”对应的正是哈布瓦赫所提出的“集体记忆”,这类记忆是集体成员在日常交往中形成的共享记忆,以口传为核心存续手段,通常不超过三至四代人^[2];“文化记忆”是社会的长时记忆,主要通过符号编码与仪式实践实现代际传承,形成超越个体生命周期的历时性记忆轴,具有稳定性和规范性^[3]。

文化记忆理论对记忆传承载体、存续时间以及代际传递时长的分层界定,清晰表现出文化记忆在短期交往传承以及长期延续方面具有的特点。就时间跨度来说,武术鼓舞文化失忆现象与该理论有较好契合度:首先,“个体记忆”和生命周期是保持同步状态的,武

术鼓舞的技艺习得、体感认知等记忆都是依附于传承主体的生命时长之上;其次,“交往记忆”的存续时间一般不超过三至四代,在这个范围内恰好能够体现出武术鼓舞传承的情况;最后,“文化记忆”是超越个体生命周期的,武术鼓舞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和精神内核恰恰就是长时记忆的核心载体,具备跨代际且能够长时间存续的特点。然而,从结构特征看,武术鼓舞文化记忆传承并非随意的日常交流,而是特定社会网络与制度中有序开展实践活动,“交往记忆”对其解释存在明显局限性。因此,本研究引入保罗·康纳顿^[4]在《社会如何记忆》中的“社会记忆”:社会记忆是特定社会群体共享、关于过去的意象与回忆性知识体系,通过身体化、仪式化的集体操演得以传递和维持,并呈现出制度化、组织化的传承结构。这一概念精准与武术鼓舞的传授环节、演练过程以及实际实践活动相对应起来,所以说“社会记忆”在本研究中有更为适宜的应用场景。具体看来,在传承结构方面,“交往记忆”主要依靠日常的随意交流进行,缺乏明确的制度规范以及组织框架,而武术鼓舞依靠的是“家庭—师徒”制,有着清晰明确的规则、流程以及组织方面的保障,严格具备制度性与组织性,这是“社会记忆”的核心特点所在,“交往记忆”是无法将其涵盖在内的^[5];在传承载体方面,“交往记忆”主要依靠口头叙事来传递记忆,而“社会记忆”是以“身体”作为核心载体的,这与武术鼓舞需要亲身传授、经过长时间反复的身体练习才能沉淀下来的特点相契合;在记忆稳定性方面,“交往记忆”易受个体叙事偏差和语境变化的影响,而“社会记忆”通过制度化的传承机制与仪式化的重复操演,形成强大历史惯性,这与武术鼓舞核心技艺需要长期稳定传承的特征高度适配。

综上所述,构建“个体记忆—社会记忆—文化记忆”的分析框架,并非对文化记忆理论的背离,而是基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与研究问题的现实性所做出的适应性调整与深化。这一分析框架使 3 个层次之间的递进关系与相互作用更为清晰,即个体记忆是基石,存在于传承者与习练者的身体与认知中;社会记忆是桥梁,通过制度化传承与仪式化操演,对个体记忆进行筛选、强化与整合,为个体记忆向稳定形态过渡提供社会场域;文化记忆是结晶,当武术鼓舞的价值、符号与仪式等通过社会记忆反复积淀而被广泛认可后,便能够升华为民族的文化记忆。

2 研究方法田野点选取

2.1 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检索“文化记忆理论”“民族传统

体育”和“非遗保护”等相关文献、政策文件和数据资料；搜集苗族鼓舞、苗族武术等方面的专著、县志和档案等。最终系统梳理出武术鼓舞的历史脉络、传承体系与文化内涵，为本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与历史依据。

2)实地调研法。研究者于2016年12月25日第一次进入葫芦镇田野点参与当地的苗年，并拜访武术鼓舞创始人HFQ，从而开始了对武术鼓舞的系统研究工作。此后每年都到田野点进行一次以上的相关研究工作，大部分时间都集中在夏季、冬季这两个季节。每次展开调研活动的时间跨度大概3~15天，累计调研时间约400天。在调研过程中，研究者综合运用了参与观察与非参与观察两种方式。当采用参与观察方式时，研究者是以“会打武术鼓舞”这样的身份融入到社群当中去，多次参与苗年、赶秋、吕洞山祭祖等节庆活动、日常训练和社会展演。采用非参与式观察方式时，则是较为系统观察村落、广场等诸多不同地点呈现出来的记忆实践场景。观察内容有武术鼓舞在不同场合下表现出来的形态、参与主体之间的互动方式、记忆的传递过程。最终累计得到田野笔记约10万字，给分析武术鼓舞文化失忆特征提供一手宝贵的资料。

3)深度访谈法。采用半结构访谈与开放式对话相结合的方式，对大概20名代表性传承人、武术鼓舞队员、村民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展开了23次深度访谈。在这些人当中，有国家级传承人1人，州级传承人2人，鼓队成员4人，普通村民9人，基层文化工作者2人，以及其他相关人员2人。每次访谈时间从30分钟到2小时不等，在征得书面或者口头同意之后，会对整个访谈过程进行录音，累计时长约为50小时。访谈内容主要围绕个人经历、代际传承以及文化记忆等方面展开。在访谈结束之后，会把录音转录成文本，并且结合现场笔记补充一些非语言方面的信息。文本数据分析运用的是“语言转换加上逻辑推理”相结合的方式。具体来讲，就是先对访谈语言加以概念化的归类处理，同时要详细描述在观察过程中所察觉到的行为以及相关语言情况，再进一步地结合文化记忆理论展开相应的推理工作，从而能够为分析武术鼓舞文化出现失忆风险时所呈现出的种种表征以及其背后的形成机理原因给予一定的数据方面的有力支撑。

2.2 田野点选取

1)田野点的选取依据。本研究选取湖南省湘西自治州保靖县葫芦镇为田野点，其主要原因是：第一，葫芦镇是湘西武术鼓舞的主要发源地和传承区。本地文化精英在此创编“八合鼓”“撼山鼓”，并且部分村落至今仍保留其活态传承形式，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记忆和实践基础。第二，葫芦镇是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非遗申报、传承人认定以及文化生态保护等方面有一定的经验，可以为分析武术鼓舞文化记忆传承状况及存在问题提供重要窗口。第三，葫芦镇既具有苗族传统村落的文化特征，又处在城镇化、人口外流等现代化的冲击之中，这种传统与现代交织的语境，正是武术鼓舞面临文化失忆风险的典型社会背景。

2)田野点的文化生态特征。葫芦镇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东南部，总人口约1.8万人，是典型的苗族聚居区。长期以来，该镇相对闭塞的交通使得苗族传统文化得以较为完整地保存，但也使其在现代化浪潮中承受着更为剧烈的文化振荡。从生计方式来看，葫芦镇村民长期以来以传统农耕为主，兼有茶叶种植等副业。由于耕地资源有限、人均收入较低，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现象十分普遍。数据显示，在2010—2020年，全镇的常住人口下降至7000余人，降幅超过了50%，18~40岁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比例甚至超过60%。这一“空心化”现象给当地的武术鼓舞传承生态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从社会结构来看，葫芦镇的村落社会是以血缘和地缘为核心纽带而形成的“家族-村寨”二位一体的基层组织形态。村民之间联系紧密，传统节庆，如苗年、四月八和赶秋节等是村落生活的重要节点。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土壤中，武术鼓舞传承长期嵌入“家族-村寨-师徒”三位一体的社会网络，形成以HFQ所在村庄为核心、向周边村镇辐射的“差序格局”。从文化空间来看，葫芦镇属于湘西非遗文化重点保护区域，有着极为深厚文化底蕴，在这里，苗鼓、苗歌以及巫傩绝技等广泛流传，并且还荣获“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苗族鼓舞)”“湖南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苗族鼓舞)”的称号。武术鼓舞作为苗族鼓舞的一种地方变体，凭借着这片文化土壤，其文化空间呈现出独特3层分布情况：核心传习空间位于HFQ的老宅及其周边的院落，这里是八合鼓的诞生之地，也是早期的教学点所在；仪式展演空间涵盖了村寨鼓堂、宗祠、村落广场等诸多场所；日常练习空间则散布于田间地头、晒谷场等各种空地之上。

综上所述，地理区位、人口结构、生计方式、社会关系与文化空间的交互作用，使葫芦镇呈现出一种典型的“文化记忆张力”结构。一方面，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深厚的苗族文化土壤，使其完整保留了武术鼓舞从创编、鼎盛到衰落各阶段的记忆痕迹。另一方面，剧烈的城镇化与人口外流，又深刻体现出记忆主体流失、记忆载体退化与记忆空间压缩三重困境的相互交织状态。这一张力结构，正是葫芦镇作为本研究田野点的核心所在，它既能够观察武术鼓舞文化记忆如何生成，也能够诊断武术鼓舞文化失忆为何出现。

3 武术鼓舞文化失忆的风险表征

3.1 武术鼓舞的个体记忆困境

1) 个体记忆传承主体老龄化与代际断层。

个体记忆是个体对生活事件、情感体验等经验信息进行识记、保持与提取的心理过程,为个体身份认同建构与自我概念形成提供了核心认知基础^[6]。这一本质决定了武术鼓舞的个体记忆传承,始终围绕“传承主体”展开。对于武术鼓舞而言,其个体记忆聚焦于“传承主体”。当前武术鼓舞面临传承主体老龄化和代际断层问题,导致其个体记忆出现断裂与流失,传承链条难以维系。一方面,武术鼓舞的代表性传承人中,老龄化特征极为显著。六合鼓创始人、国家级传承人 HFQ 今年 90 岁,两位州级传承人 LZL、SFH 年纪也已 60 岁以上。另一方面,年轻一代多外出务工或上学,导致能够参与武术鼓舞日常传承的青年群体数量锐减,其核心传承场景缺乏新鲜血液,代际传承出现明显断层。“平时镇上没有什么人,赶场的时候人比较多,但以老年人为主。年轻人主要是寒暑假时候多,因为很多人出去读书,还有就是一部分年轻人出去打工,只有过年那段时间才会回来”(镇上超市老板,ZY)。

2) 个体记忆载体的脆弱性与记录缺失。

武术鼓舞个体记忆传承依靠“口传身授”,核心载体为语言与身体。然而这两种核心载体并非绝对可靠,还存在记录形式问题。一方面,语言与身体作为记忆载体本身存在明显脆弱性,很难保证武术鼓舞技艺与文化内涵的完整存续。在语言方面,招式口诀、节奏要领等大多靠口头传递,容易随传承主体的记忆衰退而出现遗漏或偏差的情况;在身体方面,鼓点与动作衔接等核心细节依靠身体记忆,当传承主体的身体机能出现退化的时候,记忆就有可能变得模糊不清。笔者多次前往 HFQ 老师家中了解相关情况,但是由于 HFQ 老师的身体原因,只能说出一些简短的词语,大多是由他的爱人以及徒弟进行表述。另一方面,武术鼓舞个体记忆缺少系统数字化记录与备份,一旦记录介质出现意外损坏或老化的情况,武术鼓舞的个体记忆就容易丢失。“我原来好多编鼓写的、画的稿子,都被那年大火烧光了,现在想要找原始的材料都没有了。有了那次大火的教训,现在我写的画的东西都会请人录到电脑里,我存一份电子档”(州级传承人,LZL)。

3.2 武术鼓舞的社会记忆困境

1) 社会记忆传承模式单一与精英主导。

社会记忆并非静态的历史留存,而是通过代际互动、实践参与和物质载体在当下不断重构的过程^[7]。民族传统体育传承模式应当是能够对其社会记忆实现活态延续、达成当代适配并且促使深度沉淀起到支撑作

用的系统性保障。然而,武术鼓舞的社会记忆却遭遇着传承模式较为单一以及由精英来主导这样的一种困境。一方面,武术鼓舞社会记忆传承过度依赖“家庭—师徒”制,这种模式辐射范围有限,难以突破亲缘与地缘的边界。“一开始我们好多人都在学打鼓,那个时候大家都到洪老师那里学,大家都喊 HFQ 老师叫大师傅”(村民,SFC)。另一方面,武术鼓舞社会记忆传承的核心驱动力量在于本土文化精英,这种“精英主导”的社会记忆传承呈现出一定脆弱性,一旦文化精英出现“失能”,其发展便会陷入停滞。“我们这里以前打鼓的特别多,但是现在几位老师年龄都大了,也没多少人教了,打的人也就少”(村民,LMY)。

2) 社会记忆空间的乡村式微与城镇失位。

乡村是武术鼓舞社会记忆传承的重要空间,村落中心广场、农户院落、田间地头等具体的场景空间,都是通过场景氛围、身体实践和实物遗存把武术鼓舞的社会记忆具体化、可感知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城镇由于公共性、系统性和传播性等特点成为社会记忆传承的重要空间。但当前,武术鼓舞的社会记忆空间存在两种困境。一是乡村“空心化”造成记忆传承的物理场所和活动场景双双衰落。祠堂这类传统场所因为缺乏相应的维护,出现破败的现象,或者干脆改变了原来用途,那些可以承载记忆的集体实践,由于参与主体大量流失,使得其开展的频率和规模也不断减少。“全镇打鼓的那个时期,就是你从那个坡上往下看,田里、路上等能放鼓的地方到处都是鼓,一片红,但现在完全看不到了”(村民,LCF)。二是武术鼓舞在城里的广场、公园等地方有零星的展示机会,但是没有形成系统的传承阵地。“我们最早在吉首老年宫那边打鼓都是时间不固定,因为有的时候是有人有事,凑不到一起,有的时候是凑齐人了,而打鼓的地方又有其他活动”(村民,LAQ)。

3) 社会记忆传播碎片化与商业异化。

文化建构的本质在于将承载重要文化记忆的符号、仪式与叙事等通过有效途径整合为社会共享的认知结构。唯有通过系统化、整体性的传播机制才能实现文化记忆完整传递^[8]。然而,武术鼓舞文化记忆的现代化传播存在“重片段轻系统”问题,导致其完整的文化记忆难以实现有效传递。一方面,新媒体平台虽凭借其广泛的用户基础和强大的传播力,成为文化记忆传播的重要载体^[9],但对于武术鼓舞来说,大部分媒体账号仅为展示武术鼓舞,未能系统传递其深层内涵。“我看鼓王他们都把打鼓的视频都发到这个上面,一小段一小段的教,我就想着把湘拳鼓的也以这个形式,每个动作都做好,然后传到抖音上面,分享给大

家看”(村民, LCM)。另一方面, 部分商演为迎合市场需求, 简化武术鼓舞应有的文化元素, 并弱化了其精神内涵。“原本每一套鼓都是我们一连串的生产、生活场景, 但有的时候为了表演需要, 需要新的成套动作, 有的时候为了应急, 就会从原先的动作里东拼西凑成一套, 有的时候打完了, 都不知道在打什么”(鼓队成员, LXM)。

3.3 武术鼓舞的文化记忆困境

1) 文化记忆符号的核心标识模糊。

具有识别性的符号系统是文化记忆得以跨越时空、在群体中实现有效传承、积累和再现的根本保障^[10]。对于武术鼓舞而言, 其文化记忆符号呈现出“核心标识模糊”的问题, 即武术鼓舞虽作为苗族鼓舞中融合武术技击特质的特定类型, 却缺乏鲜明的符号标识, 易与其他鼓舞相混淆, 导致其独特的文化记忆难以被准确识别与传递。具体而言: 一方面, 武术鼓舞是以苗族武术为动作来源, 但其外在表现形式在外人看来与其他苗族鼓舞类型有一定相似之处, 缺乏鲜明的辨识特征。“武术鼓舞是需要有武术的精气神, 还有架子, 其他地方鼓舞动作有的较柔美、有的轻快、有的是模仿动物等, 有好多人的也不太分得清鼓类型, 湘西这边的鼓舞大家都统一讲是苗鼓”(州级传承人, LZL)。另一方面, 在公众认知与文化传播中, 武术鼓舞的边界不够清晰, 尤其是在非遗申报中, 还是将其与四方鼓、猴儿鼓和花鼓等统一归为“湘西苗族鼓舞”, 导致武术鼓舞独特的技击质感、军事渊源与文化叙事被弱化, 其文化记忆符号的核心标识较为模糊。

2) 文化记忆内涵的浅表化与基因失活。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记忆传承, 既要对其仪式的流程规范、动作范式、器物使用等表层庆祝行为进行完整留存与精准传递, 也要追溯其背后的历史渊源与民间叙事, 更要传递其中蕴含的价值理念与精神内核^[11]。但当前, 武术鼓舞文化记忆内涵呈现出“重形式轻内核”的问题: 一方面, 武术鼓舞的军事渊源仅仅是以动作符号化的形式呈现, 并没有去深入挖掘其中的深层文化内涵。“我当时编排撼山鼓是以古战场的一场战争始末为背景, 像策马征程、滚身飞刀和大鹏展翅等每个动作都有深意的。但现在来学的人只知道这些动作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这些动作代表什么”(州级传承人, LZL)。另一方面, 鼓承载着苗族人民的信仰崇拜、祖先崇拜以及尚武精神等核心精神内涵, 但随着社会发展, 其深层精神内涵逐渐被弱化。现代传承仅保留了“击鼓起舞”的表演形态, 未能对其背后的象征意义进行深度诠释。“以前打鼓之前都会搞点仪式, 现在不怎么讲究这些了, 如果是有活动那还是会有简单的

仪式, 平时大家都是拿起鼓槌就打”(村民, LCJ)。

4 武术鼓舞文化失忆的机理归因

4.1 记忆主体的行为消解

1) 传承内驱力的现代性消解。

传承主体是延续文化记忆的核心, 其传承效能从根本上依赖于以“自我认同感”为内核的传承内驱力, 这是记忆得以有效赓续的心理基础^[12]。武术鼓舞传承内驱力的消解, 主要在于现代化进程所引发的空间剥离与语境转换侵蚀了“自我认同感”的形成。调查表明, 镇上呈现了“留守型”的人口结构特征: 老年与未成年群体构成常住主体, 劳动年龄人口则是外出务工与异地陪读持续外流。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导致武术鼓舞传承出现严重断层。时空剥离不仅中断了年轻一代与武术鼓舞在地实践场景的身体联结, 也削弱了其通过持续参与获得情感认同与文化归属的可能。同时, 在现代化语境下, 效率、竞争与个体成就价值凸显, 武术鼓舞所承载的乡土伦理、集体认同和仪式意义在年轻一代的日常生活中难以找到契合点。“以前大家打鼓好热闹, 大家都熟, 就蛮有意思的。但是现在基本大部分要不就是到外面打工, 要不就是陪娃去上学, 久而久之大家都疏远。平时过年过节大家回来, 就算有人喊打鼓, 也提不起劲, 没有原来的氛围了”(村民, LWX)。当实践无法提供与现实需求相适配的情感支持、社交功能或身份象征时, 个体便难以从中获得持续的“自我认同感”。这种认同感的缺失, 使得传承内驱力从主动的文化践行异化为被动的文化疏离, 进而导致传承主体从“主动传承”向“被动疏离”的态度转变。

2) 核心标识建构的功利化消解。

核心标识建构的本质是通过独特符号体系的系统性阐释与广泛性传播, 锚定文化边界, 实现符号标识与文化内涵的深度绑定。而武术鼓舞文化记忆符号的核心标识模糊, 其根源在于各利益主体的功利逻辑主导了标识建构过程。在非遗申报与地方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 各利益主体以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 都选择以“湘西苗族鼓舞”这一响亮品牌进行申报与传播, 缺乏对武术鼓舞独立符号叙事的建构意识, 弱化了其独特性。武术鼓舞虽为融合武术技击特质的独立类型, 但与四方鼓、猴儿鼓和花鼓等一同归为“湘西苗族鼓舞”进行申报。各利益主体在开展文化传播相关活动时, 将目光聚焦在“苗族鼓舞”的整体叙事方面, 没有针对武术鼓舞的技击动作符号、军事渊源内涵等核心符号展开具体的阐释说明。“我们打的鼓叫八合鼓、撼山鼓等, 跟花鼓、猴儿鼓肯定有不同。我们打的是拳架子, 讲的是寸劲和精气神, 不只是舞蹈。但是外

面表演,节目名字基本都统一用“湘西苗族鼓舞”(州级传承人,LZL)。这种以整体范畴为核心的叙事策略,虽实现了苗族鼓舞的整体性保护,但从根本上消解了武术鼓舞的核心符号叙事,使其独特的符号标识被淹没在苗族鼓舞的整体体系中,外人难以分辨其与其他鼓舞类型的本质差异,最终造成核心标识的模糊化。

3) 传承结构的层级化消解。

文化记忆较为稳固的传承结构,应当把“广泛群体”当作根基所在,把“国家在场”作为制度方面的有力支撑,并且依靠“文化精英”来达成知识创新以及资源整合的目的,这三者当中任何一方都是不可或缺的^[13]。然而,武术鼓舞主要依靠“文化精英”的个人权威与自我奉献,使得传承结构偏离了三元主体原本应有的均衡状态,导致传承结构的层级化消解。据调研了解,武术鼓舞的传承呈现出一种“差序格局”的特点,其中以师父作为核心人物,弟子则围绕在周围起到辐射作用,整个传承过程严格遵循尊卑长幼,传承关系从核心位置开始逐渐朝着边缘方向不断弱化,最终形成亲疏有序的关系网络。这种严格师徒制所培养的“文化精英”把“广泛群体”排除在核心传承圈之外,进而让这些原本是“参与者”的人变成“旁观者”。对“文化精英”的过度依赖也导致国家难以真正“在场”,国家大多时候仅仅充当“命名者”或“背书者”的角色。尽管武术鼓舞与四方鼓、猴儿鼓和花鼓等一同归为“湘西苗族鼓舞”在2006年就被列入国家级非遗,但其传承仍依赖精英“口传身授”,始终缺乏国家的制度性支撑。

4.2 记忆载体的符号消弭

1) 具身载体脆弱的符号传承消弭。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记忆传承中,语言、身体、文字与影像构成核心传承媒介体系,其中语言与身体作为具身性记忆载体,在漫长的传统社会时期占据主导地位,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记忆延续的核心依托^[14]。语言和身体是武术鼓舞个体记忆得以延续发展的具身载体,与传承主体的生命长度高度绑定,具有一定脆弱性。随着传承人年事渐高,其身体机能与记忆能力逐渐衰退,不仅意味着个体生命进入晚年阶段,更等同于一个活态文化库难以完整呈现、一段独特的身体记忆逐渐模糊。这种与生命长度的高度绑定,使传承链条极为脆弱,任何一代的断裂都可能造成不可逆的文化记忆符号传承消弭。HFQ老师作为武术鼓舞的奠基人、“八合鼓”的首创者,晚年因身体机能与记忆能力衰退已极少出门,难以通过身体示范完整呈现武术鼓舞的动作体系与内在神韵,其关于武术鼓舞的历史渊源、创编心得及动作背后的象征意义,大多仅能通

过简单的口头表述传递。

2) 实践载体功能异化的符号内涵消弭。

仪式展演有着神圣性、规范性以及情感凝聚力的特点,是一种体化实践^[15]。但当前,武术鼓舞的仪式展演逐渐朝着以商业演出、旅游展示为主导的任务驱动型模式转变。在此过程中,其实践载体的功能出现了异化,实践逻辑从原本的“文化记忆的具身传承”转变为“商业价值变现”,最终导致文化记忆的符号内涵逐渐消弭。武术鼓舞的身体动作里承载着族群历史、信仰禁忌还有社群伦理等诸多记忆密码,然而在商业与旅游展演当中,核心的诉求变成了“更好完成表演”,而不再是去展示那些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一点从葫芦镇武术鼓舞队员的实践中就能发现,有一部分展演的时候动作就被人为地进行了修改,仅仅只是保留了一些所谓的高光动作而已。身体不再是传递文化记忆的载体,而是沦为了商业工具,其动作当中所蕴含的文化隐喻也遭到剥离,原本的记忆符号变成了供人观看的视觉奇观。

3) 新媒体载体传播的符号整体性消弭。

新媒体传播以碎片化、娱乐化与流量化为核心逻辑,其推送机制与用户消费习惯深刻重构文化内容的呈现与接受方式^[16]。武术鼓舞为适应这一传播环境,往往被迫对其符号系统进行“适应性改造”:一是从仪式整体切割为视觉片段,原本连贯的叙事性武术鼓舞被分解为孤立的“高光动作”,脱离仪式的时空语境与意义链条;二是从深层叙事娱乐化为表层奇观,武术鼓舞背后的迁徙史诗、军事隐喻与信仰内涵被替换为迎合大众趣味的“视听爽感”,文化意义的层次性被扁平化。据统计,在某主流短视频平台上,武术鼓舞相关视频中,时长1分钟以内的占比超过80%。同时,展示高光动作与动作教学的视频,其互动量远高于讲解文化内涵的视频。这种“为传播而改造”的实践,直接消解了塔尔图学派所强调的符号系统的等级性、连贯性与互文性,正是这些特性构成了文化记忆得以稳定传承的结构基础^[17]。武术鼓舞的新媒体传播,是一种去语境化、去历史化和去意义化的符号漂流,其文化记忆不再通过整体性符号编码传递,而是在碎片化中持续耗散。

4.3 记忆空间的文化压缩

1) 传习空间的文化语境压缩。

完整的个体记忆构建要在浸润式的文化环境中完成。拥有活态、完整文化语境的传习空间,是文化记忆得以稳固传承的重要场域。就武术鼓舞传习空间而言,在现代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它原本的文化语境被严重压缩,功能定位也由原来的“文化传承场”转

变为现在的“技能训练场”。在传统乡村社会里，武术鼓舞传习的空间本质就是一种文化再生产的场所，是承载集体记忆、传承地方性知识和伦理观念的场所。但在现代教育体系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武术鼓舞被剥离原生语境，被重新编码为“体育项目”或“非遗技艺”，传习的目标也由“文化浸润和身份塑造”变成“动作规范和技能掌握”。“学校里面主要是以体育课、训练队等形式传授武术鼓舞，主要是让学生动起来、会打鼓，知道这是我们自己的民俗传统”（葫芦中学教师，SG）。这种变化是将充满历史厚度与情感温度的文化实践，压缩为了去历史化、去情境化的身体技术重复，切断了记忆与意义的有机联结。

2) 社会空间的结构性压缩。

社会空间结构性压缩不仅是物理场所消失或者迁移这样的表层空间变化，而是和武术鼓舞记忆传承有关的社会关系网络、空间权力配置被系统性破坏。一方面，社会关系网络逐渐从“有机联结”向“松散断裂”压缩。武术鼓舞文化记忆的传承是嵌入到家族、村落以及师徒共同体之中，形成一种稳定且紧密的联结方式。但“乡村空心化”这一现象使得这个联结网络产生了松动态势。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外出务工与异地陪读人员占据了大部分乡村群体，其作为传承主体在空间与时间上双重缺席，亲缘与地缘纽带被不断拉伸甚至断裂，进一步导致记忆传递的根基性弱化。另一方面，空间权力配置呈现出从“民间自主”朝着“行政主导”方向发展的态势。在传统社会当中，武术鼓舞所涉及的空间场所完全由民间自行管理。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对于空间的分配情况、相关活动的审批流程以及资源的投放事宜，逐渐由行

政力量主导。虽说城镇当中存在着广场之类的公共空间，可武术鼓舞却没有被纳入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这使得其很难稳固地存在于特定场合之中。“民间”在争夺现代公共空间使用权时处于弱势，其自主性的社会记忆生产空间受到挤压。

3) 仪式空间的神圣性压缩。

仪式空间的神圣性是文化认同建构的重要象征维度，其通过剥离日常语境的平庸性，营造出超越世俗的精神空间，凝聚起群体共通的价值追求与精神共识，为个体融入集体、实现文化身份归属提供了核心依托。武术鼓舞的仪式展演往往与祖先崇拜、神灵信仰紧密相连，承载着苗族人民对祖先的缅怀和对神灵的敬畏，空间充满神圣性。但现代化进程导致仪式空间经历了祛魅，其神圣性被压缩。这一过程直观体现在仪式空间的位移与重构中，既从宗祠、鼓堂和村落广场等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转向旅游景区、城市广场和展演舞台等。“我们那个时候好喜欢打鼓，打鼓可以到处去玩，所以一有活动，我们就报名参加。到凤凰、吉首打鼓，还去深圳打了一个星期鼓，外国人夸我们打鼓打得好”（村民，LAP）；“武汉打鼓那次，是我第一次到武汉，当时想到要去那么远的地方打鼓好激动。当时我们搞完之后，还到武汉玩了，我是第一次去那么远的地方”（村民，LZQ）。武术鼓舞的展演空间已从内聚性、神圣性的本地空间扩展为外向性、展示性的跨地域场域。在这一过程中，仪式空间性质发生根本转变，它不再是通过集体信仰与历史记忆方可进入的神圣领域，而是个体以文化体验、社会认同与休闲娱乐等为主要目的的世俗性舞台（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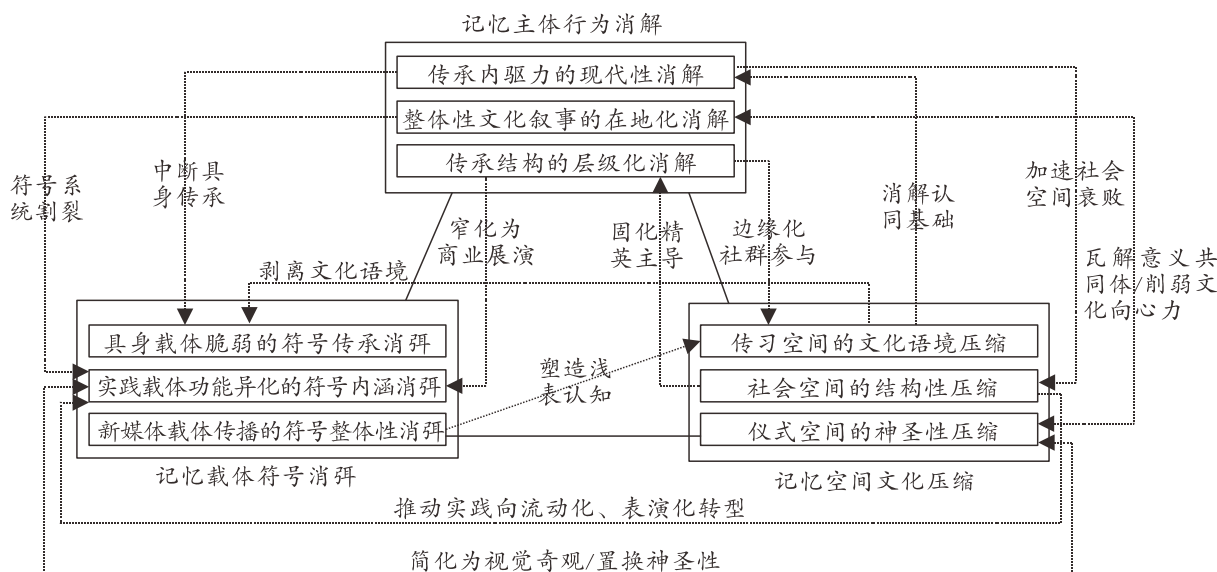


图1 武术鼓舞文化失忆的机理归因

5 武术鼓舞文化失忆的防御路径

5.1 督促个体记忆的重复, 夯实传承基石

1) 搭建“家-校-社”联动的常态化练习场景。

武术鼓舞个体记忆的巩固与深化, 需搭建“家-校-社”联动的常态化练习场景, 通过资源共享、传习衔接与成果互通等推动武术鼓舞在多场景重复练习中强化记忆。第一, 在家庭, 倡导以“亲子共习、代际传承”为主的日常练习模式。鼓励家庭设立固定时间, 由掌握技艺的长辈指导晚辈, 结合节庆、家庭聚会等场合开展小型展演与交流。同时, 家庭也可借助社区和学校提供的传习素材, 系统开展居家训练, 使武术鼓舞在家庭日常生活中得以持续践行与内生传承。第二, 在学校, 将武术鼓舞融入各学段教学: 义务教育阶段每周至少开设1节特色体育课和1次课后实操课; 高中则将其纳入校本课程, 并每月固定汇演; 高校阶段开设选修课, 形成标准化的教学与练习周期。学校将学习成果与社区实践打卡挂钩, 为家庭传习提供标准化素材与专业指导, 实现校社、家校传习衔接。第三, 在社区, 依托村委、老年协会等组织设固定练习点, 经费由非遗专项资金与乡镇财政配套统筹, 专款专用于保障鼓具、修缮场地和授课补贴等, 并实行每周5天、每日不少于1小时的传承人轮值授课制。社区为学校提供课外实践场地与师资, 为家庭提供交流展示平台, 是家校传习衔接的核心阵地。

2) 建立分层式的武术鼓舞传习培训模式。

立足于武术鼓舞的文化特性与传承需求, 应建立针对不同群体的分层式传习培训模式, 确保武术鼓舞在重复中得以固化、深化与内化。第一, 对于代表性传承人, 实施“影子传承人”培养模式, 要求1名年轻传承人长期固定跟随1名资深专家学习, 全年跟学时间不少于150天, 全程跟随观察日常传习与创作过程, 训练核心是对动作细节、节奏韵律及创作心法进行高精度、高强度模仿, 将技艺精髓通过日复一日的实践, 沉淀为个体稳固的身体记忆。第二, 对于本土武术鼓舞爱好者, 定期举办不少于10天的封闭式集训营和每月1期的周末工作坊, 提供从入门到提高的系统性课程, 训练内容从单一动作的规范性重复, 到组合套路的连贯性重复, 再到仪式展演的情景化重复, 每一次重复都是身体记忆的巩固。第三, 对于在外生活的武术鼓舞爱好者, 建立“定期线下集训+远程互助辅导”的传习培训模式, 每年至少组织1次的线下集中沉浸式集训, 平时则依托线上平台, 通过标准化视频跟练、每周1次的直播答疑和每月不少于10次的作业打卡等方式维持日常重复的基础训练。同时鼓励其所在地组建练习小组, 开展定期活动, 将个人重复

练习转化为小组共学互促的社群化重复实践。

3) 打造数字化的武术鼓舞记忆强化平台。

数字技术通过虚拟修复、场景复原等技术手段活化文化记忆的储存形式, 使原本固化的历史符号获得动态演绎的生命力^[18]。因此, 可打造武术鼓舞记忆强化平台, 破解记忆载体脆弱、线下练习时空受限问题, 为个体记忆强化提供重要支撑。第一, 进行数字化采集建档, 对武术鼓舞的影像资料、实物遗存以及口述史等资料进行分类采集, 并建立档案数据库, 免费向传习者开放, 为记忆重复提供权威的原始依据。第二, 组织数字化讲授素材, 运用高清多机位录像、三维动作捕捉等技术, 全息收录代表性传承人的完整技术, 确立可360°观看的“数字化讲授模板”, 同时录入招式与口诀的音频, 文字与故事简介, 以满足不同层次人群所需。第三, 开发武术鼓舞专属APP或线上平台, 同时植入数字化纠错方案, 能让习练者的每次录像即时播放对比, 进行错误提示。平台还可以设置学习进度截图、打卡积分、积分兑换线下集训机会, 传承人一对一指导, 激励常态化重复练习。第四, 建立长效运营维护机制, 让专业技术人员与代表性传承人联合负责平台日常运营与内容更新, 确保平台既专业权威, 又贴近传承实践, 确保学习者随时随地可借助平台开展标准化、高质量的重复练习。

5.2 重构社会记忆的符号, 修复传承网络

1) 提炼核心记忆符号, 编制标准指南并落地推广。

核心记忆符号是武术鼓舞得以有效传承的重要载体与媒介。提炼、规范并创新武术鼓舞的核心记忆符号, 可以提升武术鼓舞文化认同、促进有效传播, 进而实现武术鼓舞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首先, 组织符号学、体育学和传播学等专家学者与代表性传承人共同论证, 提取武术鼓舞核心动作符号谱、基本鼓点鼓律和典型仪式中的核心记忆符号, 按照类别分门别类整理、命名、编号, 制成图文音像并茂的动态数据库。不仅要为其存档, 更要用作后续传承、教学、创新的母本蓝本与共享库, 保持武术鼓舞文化基因的纯净、可回溯。其次, 对提取出的核心记忆符号予以规范记录与现代化诠释, 编成《武术鼓舞动作技术标准与文化释义的专项指南》, 并转化为不同层面的课程与考核标准, 用于传承主体的规范培训、学校体育传授以及社会普及工作内容等, 降低学习门槛, 拓宽传承面。最后, 鼓励和引导在规范后的符号下进行再创造, 产生各种应用背景下的符号衍生内容, 在应用过程中再根据实践反馈继续进行优化、补充、调整, 使核心记忆符号成为全社会共享共用的、活态的公共资源。

2) 活化乡村记忆空间和嵌入城镇传承阵地。

社会记忆得以存续并实现再生产，其依靠的并非仅仅是符号系统，实际上是深深扎根于展演、传承以及强化所涉及的社会空间与实践载体之中。系统性修复武术鼓舞传承的物理空间与社会场域，拓展多元化实践载体，是重构其社会记忆符号的关键举措。一方面，活化乡村空间，针对那些有着原生记忆的宗祠、鼓堂等这类场所，要切实做好保护工作并且对其进行升级改造，而修缮所需要的经费应当通过专项资金来统一进行统筹安排。在保护修缮的基础上，可凭借这些场所设计部分沉浸式文化体验项目，进而打造武术鼓舞相关的乡土研学基地和特色文旅节点，推动乡村空间向功能活化转变。另一方面，嵌入城镇传承阵地，把武术鼓舞纳入城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在市民广场等公共空间设立规范化的传承点，要有固定的教学时段、标准的课程体系以及专业的授课人员，以此培育新型传承社群与文化消费模式。同时依靠城镇的各个传承点组建“武术鼓舞传习社”，通过举办公开课等活动吸引居民参与，形成以点为基础、联动成为网络的城镇传承网络。

5.3 锻造文化记忆的韧性，提升系统生命力

1) 启动“武术鼓舞文化基因解码与阐释”工程。

锻造文化记忆韧性不能只停留在技术传承层面，必须为其确立深刻同一的意义解码。这就需要大力开展由政府牵头、传承主体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武术鼓舞文化基因解码和破译”工程专项行动，其目的不在于为武术鼓舞立起一套外在的技法标准，而在于为其赋予一种内在的精神意义。首先，应由历史学、人类学、哲学和体育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武术鼓舞代表性传承人组建攻关团队，提炼、解码武术鼓舞的祖先信仰文化基因、迁徙记忆文化基因和生态认知文化基因等。其次，应将研究成果有效向公众普及、沉浸式转化。例如，通过出版武术鼓舞历史、故事图文书，拍摄系列专题片，沉浸式数字项目开发等，将这些精神意义转化为大众可认知、可分享的大众文化。最后，建立文化基因解码和破译的滚动开发和反馈机制，通过不断与公众对话，伴随时代变化、公众反馈，不断做出内容修订和形式推新。同时，要联动所搭建的“家-校-社”常态化练习场景，成果融入基础教育、民俗活动与公共文化服务等，实现文化基因的活态传承与当代活化，让武术鼓舞的深厚文化内涵得以进一步诠释，强化文化记忆的韧性与生命力。

2) 打造具有核心标识的武术鼓舞文化品牌。

打造有核心标识的武术鼓舞文化品牌是强化文化记忆韧性的关键助力。首先，应立足于武术鼓舞独有的文化基因，提炼出经典的品牌内核，并设计专属的

视觉IP、品牌口号以及传播符号等。如以“鼓武相融”为理念，设计融合鼓形、武术姿态的标识，搭配易于传播的口号，塑造具有感染力的品牌认知。其次，积极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实现武术鼓舞核心品牌的传播：线下可举办“中华武术鼓舞大会”“全国非遗鼓舞展演季”“武术鼓舞传承与创新年度论坛”等标志性品牌活动，强化实体方面的影响以及推动业界间的交流；线上可充分利用短视频、直播和新媒体平台等打造“武术鼓舞小课堂”“传承人故事”“创意改编展示”等既轻量又富有趣味性的内容，提升品牌活跃度与影响力。最后，应着手构建一套关于武术鼓舞的品牌标准体系，要对授权方面、展演流程以及内容标准等予以规范，从而避免出现过度商业化以及同质化的情况。与此同时，还需要着重培育那些有品牌意识的传承人队伍，积极鼓励参与到品牌建设以及传播相关事宜当中，进而能够精准且生动地将文化记忆传递出去，以此保证品牌能够拥有旺盛生命力。

3) 推动武术鼓舞的当代转化与多维创新。

实现当代转化与多维创新是锻造武术鼓舞文化记忆韧性的时代需求。核心在于要坚守文化基因的前提下，推动武术鼓舞的相关内容、形式和载体当代转化与创新，以提升时代契合度。第一，实现内容与产品的创新性转化。加大内涵挖掘力度，使武术鼓舞的产品与服务与当代人的审美情趣、消费趣味无缝对接，焕发出新的吸引力。例如，汲取武术鼓舞经典动作元素，创编适合不同年龄段的“武术鼓舞健身操”；开发以武术鼓舞相关文创产品、数藏和动漫等，让当代青少年理解接受并乐在其中。第二，加强数字转化力度。将扩展现实、人工智能和元宇宙等融入武术鼓舞的传承和传播，开发“武术鼓舞云端博物馆”“数字传承全息教学”“武术鼓舞网络大赛”等项目，让时间和空间因素不再成为阻碍，构筑可多人交互的虚拟世界。第三，拓展业态与产业融合。推动武术鼓舞与旅游、艺术和康养等产业融合发展，培育文化消费新热点。例如，武术鼓舞与旅游景区的山水、历史和生活习俗等结合，厚植旅游景区文化内涵；将武术鼓舞与城市公共艺术、街区景观和品牌活动等结合，成为重要的地方文化符号；探索武术鼓舞与康养产业融合的相关理论，创编武术鼓舞疗养、舒缓身心的技术，推动武术鼓舞与康养产业相融合。

武术鼓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鲜活生动案例，它用身体符号、仪式表演的形式，成为中华民族积淀文化记忆、维系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本研究对现代化进程中武

术鼓舞所面临的失忆风险进行系统分析:个体记忆存在传承主体老龄化与代际断层、记忆载体脆弱与记录缺失的风险;社会记忆存在传承模式单一与精英主导、记忆空间乡村式微与城镇失位、传播碎片化与商业异化的风险;文化记忆存在符号系统共识性编码缺失、内涵浅表化与基因失活的风险。其深层机理可归结为记忆主体的行为消解、记忆载体的符号消弭以及记忆空间的文化压缩。为应对上述风险,提出督促个体记忆重复,夯实传承基石;重构社会记忆符号,修复传承网络;锻造文化记忆韧性,提升系统生命力的防御路径。研究不仅为武术鼓舞的活态传承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其以“文化失忆”为切入点的反向审视思路,也可为其他面临类似传承危机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乃至更广泛领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重要启示。通过系统性的记忆韧性锻造,武术鼓舞方能够有效抵御现代性冲击,在坚守文化根脉的同时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从而为增强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全新动能。

参考文献:

- [1] 左路平,吴学琴.论文化记忆与文化自信[J].思想教育研究,2017(11):49-53.
- [2] 扬·阿斯曼,陈国战.什么是“文化记忆”?[J].国外理论动态,2016(6):18-26.
- [3] 吴盛博.“聚焦学理中国”从记忆到文化记忆——一种跨学科的文化阐释范式[EB/OL].(2024-06-18)[2025-12-20].https://cssn.cn/skgz/bwyc/202406/t20240618_5759364.shtml
- [4]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5] 吕思泓,李文鸿,赖炳森,等.师徒互动与民间武术组织建构——冠县梅花拳传承协会个案分析[J].体育学刊,2024,31(1):79-86.
- [6] 李阳瑞,李明蔚.社交媒体时代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互构关系及其档案治理[J].山西档案,2024(6):104-107.
- [7] 杨曙光.“遗产化”到“生活化”:乡村文化遗产活化的社会记忆再生产[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46(7):39-47.
- [8] 王稳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机理及其实现[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8(5):67-74.
- [9] 张哲.文化记忆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价值及其强化路径[J].思想理论教育,2025(9):65-71.
- [10] OUYANG H, WANG X. Signs and symbols: A visual culture study of civilization markers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J]. Journal of Ecohumanism, 2025, 4(1).
- [11] 张宏邦,卢柯含.塑造与凝聚:民族传统节日中的文化记忆与民族认同[J].民族学刊,2024,15(12):87-95+151.
- [12] 李鸿宜,韩重阳,姚蕾,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困境与发展对策[J].体育文化导刊,2020(5):49-54.
- [13] 杜俊儒,王明建.传统武术社会组织的文化建构与赋权——基于北京M武术社的质性考察[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3,46(4):63-75.
- [14] 韩玉姬,王洪坤,宋秀平.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机制综论[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2,45(2):132-144.
- [15] 匡翼云.社会记忆中凉山彝族非遗“玛牧”的保护与传承[J].民族学刊,2024,15(7):79-88+154.
- [16] 冯蕾,陈佳倩.传播仪式观视角下《典籍里的中国》建构文化记忆探究[J].新闻爱好者,2022(11):69-71.
- [17] 康澄.文化记忆的符号学阐释[J].国外文学,2018(4):11-18+153.
- [18] 李楠,杨燕.数字时代传统文化符号的媒介化阐释[J].学习与探索,2025(11):135-140.

